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瑤《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17 字数 26 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 \frac{1}{2}$ 插页 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 册

定价(4) 0.16元

在階級社会里被写下来的文学史，都是一定階級对过去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作品及文艺思潮的一种評述和概括，它里面强烈地反映着这一階級的文艺思想，体现着这一階級的立場和要求：維護什么和反对什么。王瑤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簡稱《史稿》），自然也沒有例外；揭开他所引用的形形色色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我們可以看到鮮明的資產階級的文艺思想，是貫穿全書的中心綫索。

在思想、学术領域里，当前正在展开拔白旗、插紅旗的斗爭，王瑤先生显然沒有認識这一斗爭的革命的意义，他缺乏批判自己的誠意，还在欺騙群众，把自己列入紅色专家的队伍，說“我們和資產階級學者們一向就抱有根本分歧的观点”（見《文艺报》1958年第一期），背后譏笑帮助他进行学术批判的青年学生。因此从文艺思想上来揭穿他的欺騙、揭穿他的資產階級本色，向他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他出一身汗，以便好好治疗，是很有必要的。

文学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呢，还是纯个人的活动的产物？文学事业是阶级的，还是个人的？这是文学史研究上的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斗争的焦点。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文学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产物；作家则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他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来描绘和评价社会生活、并参加社会斗争的。因此，要探讨文学的历史，特别是探讨这样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带有强烈阶级性、党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如果离开了反映论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没有联系社会斗争和作家的阶级基础来考察，那么他所描绘出来的图景，必然是掩盖文学现象的社会本质，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伪科学。《史稿》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作者把文学现象描写成离开现实斗争、离开阶级基础的个人活动的产物。

这表现在关于文学运动的评述上。以五四文学革命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次革命的深远的意义。决不只是文学上的，由于它是五四运动的先导，是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的一翼，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便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酝酿和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这种文学上和政治上的划时代的意义，资产阶级学

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抹杀它，歪曲它，以便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胡适这个臭名远扬的战犯，就是头一个篡改这段历史的角色。他说：“白话文学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迟出现二三十年。”在这段文字后面，他还把自己所得到的一个纸条，一首打油诗，和在美国的游湖等偶然的身边琐事，都看做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因子”^①。这种不要脸的戏台里的喝采，在我们看来，恰好暴露胡适的无知和卑鄙；可是，对于景仰胡适的学者们，如王瑤先生，却被奉为金科玉律。《史稿》里“文学革命”一节，好象有意用具体材料来“论证”胡适的观点。在这里，开头就从半空掉下来《新青年》的刊物，是陈独秀主编的；在大片引文之后，又掉下来胡适的《文学改良芻议》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等，使我们惊异的是，翻遍《史稿》中评述五四时期文学运动的第一章，也找不到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社会原因的解釋，找不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者虽然也谈到《新青年》，但仅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至于李大钊等同志当时发表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那是不屑一顾的。在这里，王瑤一句也没有提到，胡适的提倡白话文，只是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所谓美国文明等腐朽发臭的东西，他完全勾销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了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甚至连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究竟代表那个阶级说话也不为作者所理会。总之，离开社会、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潮流，作者只是告诉我们：文学革命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一班人活动出来的。

这不能不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荒唐的见解。如所周知，白话文学不是从胡适、陈独秀的提倡才产生的，而是起源于市民阶层的讲唱文学，是早就有了的；至于白话文学的提倡也不是从胡适、陈独秀开始，而是清朝末年劳乃宣、黄遵宪、梁启超等早已有见及此，大为倡导的。而且其中有些人的主张，比起胡适的“文学改良”来，还要高明得多。那么，为什么在这以前，不能称为文学革命？白话文也不能打倒文言文呢？这是把历史描写成几个人活动产物的学者如王瑶先生所无法解答的。谁都知道，文学革命开始于酝酿五四运动的前夕，两者是密切联系不能分割的，离开了对五四运动的社会条件的考察，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在原有的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有了大的发展，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又给中国以巨大影响，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这就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变动了，政治情况变动了，文化、思想也

跟着变动了。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当然也不能不变动。为了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識的巨大变动，文学內容也发生了变化。但文言文的形式限制了它的表現和傳播。內容和形式矛盾的结果，是內容决定形式，革命的內容要求废弃落后的形式。这时，从宋、元、明一直到五四前夕的白話文学就成了新文学在語言形式方面，要加以繼承和发展的寶貴傳統。所以这是政治經濟发展的結果，是新內容发生的結果，同时也有它的文学本身的历史根据。正是在这个社会基础上，新文学运动才取得了革命的性質，并以雷霆万鈞之力打倒了文言文。抽去了它的基础，即有百陈独秀、千胡适之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象王瑤那样把文学革命描述成几个人活动的产物，就不能不严重歪曲它的社会本質，抹杀无产階級的思想領導，否定它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及为这个革命服务的史实和意义。

王瑤也許要为自己的錯誤辯解，說他在緒論里已分析了文学革命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辯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們認為，緒論只能是全書內容的概括，决不能用它来代替正文。可是《史稿》的正文却严重忽視文学运动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因而緒論的內容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是插在头上的几根假孔雀毛。所以說它“假”，是因为其中就有許多原則性的錯誤，如肯定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領導者”，就是一例。因为王瑤在这里表現的也依然

是資產階級唯心史觀。這就是脫離社會來觀察文學現象，把文學革命從社會革命孤立開來，否認文學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沒有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觀察文學革命，因此他就否認社會革命的領導者必然在政治方向上也領導着文學革命，否認以初步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生力軍既領導五四運動也領導文學革命的史實和真理。

脫離社會基礎、階級基礎來評述文學運動，還表現在其他各個時期。例如關於“左聯”的成立，《史稿》是這樣寫的：“1930年2月16日留在上海的文學工作者開了一個討論會，會中產生了左聯的籌備會，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正式成立了。”在王瑤筆下，黨的領導被抹殺了，左聯被歪曲成純粹自發性的群眾團體。

離開社會和階級來描述文學發展的圖景，必然只看到個人的活動，看到個人在創造歷史，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個人崇拜。《史稿》對魯迅先生的評述，就是如此。作者也寫到魯迅參加五四運動，但他從那里汲取力量的，他代表那個階級參加戰鬥？作者一點也不願意提到，這就不能不在本質上歪曲了魯迅先生。我們知道，從魯迅這時期的小說、雜文和戰鬥業績來看，他是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由於他跟中國農民的生活和思想上的聯繫，他是帶着農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參加戰鬥的。他把自己解剖社會的焦點，放在農民身上，決不是偶然的。十月革命

的胜利和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給魯迅以深刻的影响，他自觉地服从革命前驅者的領導，名符其实地把自己的創作称为“遵命文学”。在《圣武》里，他热情地贊頌十月革命的人民和他們所信仰的主义，并从这里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所以他表现了最坚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是跟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任务相一致的。但王瑤却抹杀这一切，把魯迅先生描繪成脱离集体的个人英雄，这正反映出王瑤的资产阶级的立場、观点。

特別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对后期的魯迅及其与左联的关系的評述。王瑤一句也不談到魯迅自己在《而已集》和《三閑集》里所一再說明的他的思想跃进的社会根据，不談到党所领导的深入的革命斗争和馬克思主义的学习，怎样帮助他“从紳士阶级的逆子貳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在王瑤歪曲下，魯迅先生是依靠純个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参加了战斗，并領導着左联的。关于左联十年文学运动的第六章，作者用了一句概括性的話：“魯迅領導的方向”来做标题，是別有用意的。在唯心史觀的王瑤看来，魯迅是駕于党之上領導着左联的，所以在《史稿》初版里，竟荒謬地出現了“魯迅毛澤东領導的方向”（上册15頁）的提法。后来王瑤虽然修改了這句話，但絲毫也沒有改变他对問題的理解。請看下面的一段話：

我們說“魯迅領導的方向”，就是因为魯迅先生通过了

左联，与党发生了經常而密切的关系，党給了他支持和力量，同时当然也用了他自己的积极和主动的战斗業績，遂使他成为我們文化战綫上的一面伟大的旗帜了。

——上册 16 頁

这个解释，完全是“魯迅毛澤东方向”的另一种更为具体的說法。在王瑤的歪曲下，不是党通过自己的党员，去影响和团結魯迅先生，組織了左联，領導了左联的斗争，而是“魯迅先生通过了左联，与党发生了……关系”，是魯迅首倡和領導了左联，而党只居于一旁“支持”的地位。这种荒唐的解释是完全經不起事实的反駁的。首先是社会革命斗争領導着、决定着文学战綫的对敌斗争，正是1927年以后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党在这一形势下的政治战略，决定着成立左联的必要，和規定着左联的組織路綫和斗争任务。从文学界本身来看，在党所領導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广泛传播的教育下，再經過了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論爭，不但已經形成了一批左翼作家，而且也感到在敌人文化“围剿”的环境下，有組織起来、統一步伐以共同作战的必要。所以左联不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內的文艺界統一战綫的組織，相反地是以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文人及其思想作为斗争对象的党内和党外的左翼革命作家的組織，这是跟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的政治战略相一致的。所以离开党所領導的社会革命斗争来談左联的領導和方向問題，

必然是錯誤的。即以左聯成立的具体經過來說，左聯是中共江蘇省委派夏衍、馮乃超等同志聯系和團結左翼作家組織起來的，是从一開始就由黨直接領導的文藝團體，後來更有瞿秋白、周揚等同志參加領導。所以左聯決不是象王瑤所歪曲的那樣是個自發性的團體，也決不是魯迅首創和領導了左聯，而黨只居于一旁“支持”的地位。自然，黨是十分尊重魯迅先生的戰鬥業績和社會影響的，所以魯迅也是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並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的。但這決不能被解釋成魯迅駕于黨之上領導着左聯。所以王瑤筆下的所謂“魯迅領導的方向”，它的唯心史觀的反動實質是十分明顯的。

从这个荒謬論點出發，作者在寫左聯時期文藝運動時，貫穿着一個中心思想：沒有魯迅，就沒有左聯，沒有魯迅，就不能取得左聯對敵鬥爭的勝利。這跟馮雪峰在《回憶魯迅》里所販賣的是同樣的貨色。馮雪峰說：“只要有魯迅存在，左聯就存在。只要魯迅先生不垮，左聯就不會垮。”這完全是天大的謊話。魯迅的一生，就是最有力的駁斥。遠在五四時期，魯迅就說自己是“聽將令”的，毫不夸大他個人的作用。以後，魯迅先生更是自覺地服從黨的領導，並多次地表示：中國人民的希望寄托于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即使在重病垂危中，他也熱情地贊頌我們黨“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並把黨的兒女“引為同志”而感到光榮（《答托洛

茨基派的信》)。即以左联的对敌斗争而論，魯迅誠然是發揮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但瞿秋白、周揚等許多同志所共同發揮的集体的战斗作用更不容忽視，而且魯迅的力量正是融合于集体之中才显出他的威力的。这是十分清楚的，魯迅之所以伟大，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他自覺地在党的领导下对敌进行了坚韧的斗争。从我們的观点看来，无论怎样卓越的人物，只有当他的个人活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根本要求，并且納入社会先进力量的行列，他的卓越才能和战斗威力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他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和毛主席給予魯迅的革命功勋，以十分崇高的评价。用唯心史觀来“抬高”魯迅，把他描写成駕于党、駕于集体之上的个人突出，不但是歪曲历史真相，而且也是对魯迅人格的最大的污蔑，因为个人突出是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与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魯迅的高貴品質是決不相容的。不論是馮雪峰或王瑤，他們的唯心史觀及其对魯迅的个人崇拜，正暴露了他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

《史稿》的个人崇拜也表現在把历史的丑角装扮成英雄的角色。在王瑤的吹捧下，胡适成了新文学的先鋒，胡风成了詩坛的主将，“提倡和鼓励了詩的发展”，而馮雪峰則成了替历史做总结的一代权威。在《史稿》的大量引文中，以引用馮雪峰的文章为最多。历史証明：胡适不是什

么新文学的先锋，而是投靠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先锋；胡风不是什么诗坛的主将，而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他所鼓吹的诗却是射向革命的毒箭；而馮雪峰的文章，則是在革命队伍内部系統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的臭貨色。王瑤对他們的贊揚和崇拜，除了說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跟他們一脉相通以外，很难有其他的任何解释。

《史稿》对作品的分析，也同样背离了历史唯物論的原則。它的主要特征是脫离了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作者的阶级评价，往往孤立地作形式的褒貶和分析。这一点，我們將要在第三部分里作較詳細的論述。

总之，王瑤关于現代文学的文艺运动和作家、作品的評述，都严重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这是跟历史唯物論根本对立的。在我們看来，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識形态，是被經濟基础决定的。自然，意識形态也有它本身的传统和受上层建筑中其他現象的影响，但最終的决定因素还是經濟，所以探索文学現象的发展变化，必須首先到經濟基础中去找原因。如果背离了这一点，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在阶级社会里，經濟基础的矛盾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文学作为一种意識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阶级斗争的现实和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服务于一定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任务。所以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现实，离开了作家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把作家和作品解释成一种超现实的現象，象王瑤所

做的这样，就必然要在本質上歪曲作家与作品，必然不能揭示文学发展的規律，甚至还把它塗写成一笔糊塗賬。当然，这正是一切資產階級学者的立場和观点所决定的。

二

王瑤既然离开了社会历史条件，用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現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把它描繪成偶然事件的堆积和个别人物活动的結果，这样就必然否認无产階級思想和共产党在現代文学发展上的伟大意义和指导作用，就必然歪曲新文学的性質。

关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質問題，是我們和資產階級学者、反党分子斗争最激烈的一个問題。因为对文学性質和領導思想的想法，不仅关系到对整个現代文学运动和具体作品的評價，而且也是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两种立場、观点斗争的集中表現。如上所述，中国买办資產階級的文化代表胡适認為文学革命是由一些偶然因素促发起来的，并且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成新文学的創造者。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反党的修正主义分子馮雪峰則認為中国的新文学是西欧資產階級文学“一个新拓的支流”。总之，他們都极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文学。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

象的反映，是有階級性的，并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社会现实斗争的性质变了，作为反映这个现实的文学也会适应不同的政治要求，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决定整个文学性质的是它的领导思想和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革命的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在现实斗争的土壤上，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它的任务是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文学必须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需要，成为重大的启蒙工具和思想斗争的武器。于是从五四前夕发生的文学革命运动，便彻底否定过去的封建文学的反动内容和僵死的文言形式，开始出现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白话的新文学，劳动人民逐渐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整个文艺运动是“沿着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向前发展”的^①。因此，五四以来的文学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一般民主主义倾向的文学发展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的性质，从其担负

①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5月号。

的任务来看，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的，从其领导思想和发展方向来看，又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

自称“和资产阶级学者一向抱有根本分歧”的王瑤先生是怎样認識新文学的性质呢？

王瑤先生在形式上說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一翻开緒論就可以看到大量引用的毛主席的話。但重要的不在于形式和引証，而在于他的实际看法和貫穿全書的基本观点。

王瑤在《史稿》緒論里写道：“中国新文学史既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决定。”看来王瑤似乎真的“运用了新观点和新方法”，但事实証明这只是一种魔术师的障眼法。他把新文学的所謂“阶级思想的性质”和它的“内容的历史性质”对立起来，然后又用挖心的战术，偷偷地挖掉了新文学中的决定因素——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他說：“我們只能說新文学在文学史的时代划分上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范围，而不能說新文学内容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上册8頁）。照这样說，并不是因为它有了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才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只是在時間上“属于无产